

本报记者专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

新版清单更开放更透明更国际

自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修订
遵循三原则

率先推进服务业重点领域扩大开放

提高透明度，提升开放度

考虑自贸区现有产业基础和未来经济功能定位

图 TP

本报记者 陈杰

今天凌晨，备受关注的 2014 年修订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公布。

与 2013 版相比，新版“负面清单”实现了大幅“瘦身”，其中特别管理措施由原来的 190 条调整为 139 条，调整率达到 26.8%。

今天上午，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戴海波表示，2014 版“负面清单”主要

体现了三个方面的特点：

- 开放度提高
- 透明度增加
- 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

开放度提高。2014 版“负面清单”在 2013 版基础上，减少 51 条管理措施，实质性取消和放宽 33 条。

透明度增加。对于 2013 版“负面清单”，一些企业曾反映，对某些管理措施的条款“看不懂”，也搞不明白。“2014 版力求做到限制条件明朗，表述清晰明确。”戴海波说。

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方面。戴海波介绍说，2014 版“负面清单”强化了准入阶段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相关管理措施，至于针对内外资一样的管理措施便不再表述。“而且，你可以注意到，2014 版与 2013 版在列表方法上也有差别，表述更加简洁，格式也与国际通行样式一致。”三个方面的特点体现自贸区外商投资管理水平有了进一步完善。

除了鲜明的特点，戴海波还特别提到 2014 版“负面清单”出台的

于法有据。“作为此次修订的重要依据，2014 版‘负面清单’的出台依据，有国务院刚刚批复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相关法规后续还将进行调整。”

戴海波强调，“负面清单”的修订完善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还有遗憾的地方，还有改进的空间。初期，“负面清单”的修订频度可能会高一些，但改革是按照预定的节奏在走。

“瘦身”51条 调整26.8%

与 2013 版相比，新修订的自贸区“负面清单”大幅“瘦身”。其中，特别管理措施由原来的 190 条调整为 139 条，删除 51 条，调整率达 26.8%。

18个行业门类 139条特别管理措施

修订后的“负面清单”列明了上海自贸区内对外商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与 2013 版一样，依旧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来编制，包括 18 个行业门类。

记者对比 2014 版和 2013 版的“负面清单”后发现，修订后的新版中，因扩大开放而实质性取消 14 条，因内外资均有限制而取消 14 条，因分类调整而减少 23 条，总共删除了 51 条。此外，还有实质性放宽的条款共 19 条。

在所有 139 条特别管理措施中，按照产业类型来分，第一产业有 6 条，第二产业有 66 条，第三产业为 67 条。按照措施类型来分，限制性措施有 110 条，禁止性措施有 29 条。

制造业及交通运输 删减修订条款最多

在 2014 版负面清单中，制造业减少、修改的条款最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次之。

记者在制造业的条款中看到，修订后的负面清单删除了多项条款，对造纸和纸制品业、精炼石油产品制造、化学药品制剂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专业设备修理等方面的多项限制投资都取消了。不过，制造业中也新增了一条：投资海洋工程装备(含模块)制造与修理需中方控股。

除了直接删除，通过修改和补充，提高开放度的条款也不少。例如在航空运输业，2013 版负面清单对于订座提供的限制措施，将限制对象表述为“除香港、澳门服务提供者以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投资者”，而在 2014 版中修改为“除中国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议允许的相关世贸组织成员服务提供者”。

部分条款删减 不代表开放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管理措施在新版“负面清单”中消失了，并非是因为放开，而是因为内外资均有限制，不必在负面清单中单独列出。例如，在娱乐业中，“禁止投资博彩业(含赌博类跑马场)”、“禁止投资色情业”的删除，就不代表开放。

此外，根据增加透明度的要求，部分条款在具体限制条件上进一步明确了。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的“道路运输业”中，补充了“从事道路客运站(场)经营须合资(外资比例不超过 49%)或合作”。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戴海波解读自贸区运行情况

陶磊 摄

【专家聚焦】

孙立坚：政府职能转变的一大进步

今天上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4 版“负面清单”总的方向是在不涉及国家安全以及民族重大培育产业的前提下，在更多行业实现投资贸易的便利化。

在“负面清单”修订过程中，有关部门对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有序开放领域，对养老、建筑、会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放开领域，以及一般制造领域的管理措施，采取了能取消则取消，能放宽则放宽的态度。

同时，将农业、采矿业、金融服务、电信服务、航空服务、基础设施等涉及资源、民生和国家安全

的领域以及中药、茶叶、黄酒、手工艺品等我国传统产业领域的管理措施予以保留。

“其实，这背后有一个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孙立坚坦言，对有些部门来说，“负面清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放权，而放权又往往意味着“让利”，但是管理责任并没有减少。所以，在操作层面日益清晰、

透明的背景下，自贸区的实验目标是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增加和风险控制。

当然，他认为，“负面清单”的制订和修订要放在国际大背景下来认识和考虑。“国际商业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差异，都让我们要对‘负面清单’有宽容度。”

孙立坚认为，“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它倒逼改革、催生创新，但同时也孕育着到

现在为止我们未知的风险。借鉴别人的经验，分析中国的国情，从而探索出一条可持续的开放与发展道路，是今天参与上海自贸区实践的所有企业、机构和监管部门都应该肩负的历史使命。“追求高附加值、高标准的投资、高效率的金融服务，这是上海自贸区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的重点。”孙立坚说，实现“三高”，需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形成市场和政府良性互动的新模式。

本报记者 陈杰

林采宜：与产业转型升级导向契合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博士仔细对比了 2013 版和 2014 版的“负面清单”。她认为，与 2013 版相比，2014 版“负面清单”与我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战略契合，主题就是“制造业升级换代，服务业进一步对外开放”。

林采宜分析说，从管理措施的调整可以看得出，上海自贸区鼓励高端采矿业、高端制造业的外资进入，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工

艺，目的是对我国相关产业的转型发展有好处，也能实现“进口替代”战略。“本来这种东西只能靠进口，现在可以通过引入外资，实现本土生产。”

另外，2014 版“负面清单”实际上鼓励外资投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发展达到巅峰的时候，推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就来自于服务业。这是许多发达国家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发展的

必然选择。”

比如在海洋工程、专业设备、船舶修理、船舶代理等方面的有条件开放，林采宜认为与上海打造国际航运中心有密切的关系。“洋山深水港的货物吞吐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与它在世界航运中心的评价名次不相符，比不上欧洲的鹿特丹。原因在哪里？因为航运中心量级评价参考的指标权重中，航运服务的权重超过吞吐量。”

通过“负面清单”来引导产业

转型，林采宜认为中国从制造业主导大国向服务业大国的转型正当其时。“十年前、二十年前，我们着力引进的外资企业行业结构和今天完全不同，目标是为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动能。高端制造业也需要生产性服务业的配合。”而作为社会服务业，医疗机构和文化产业有条件开放的象征意义大。在医疗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外资医疗机构的引入有助于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本报记者 陈杰